

全球史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評丘為君《啟蒙、理性與現代性：近代中國啟蒙運動，1895-1925》

● 趙 兵

晚近以來，海內外學者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不斷呈現出一些新的面相。近年來諸多研究者試圖從「全球」與「地方」內外兩個維度來重新理解與闡釋五四新文化運動。丘為君新著是以全球史（歐戰）的視角來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種有益嘗試。



丘為君：《啟蒙、理性與現代性：近代中國啟蒙運動，1895-1925》（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

論及中國的啟蒙運動，人們自然會想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對於現代中國而言，是一個已成為歷史卻不能放入歷史博物館的特殊事件，因為它深刻地影響了現代中

國的歷史走向，也不斷地與現實發生勾連。張灝注意到，「五四」是一個需要不斷重訪的話題，它背後蘊藏着十分豐富而又緊張的思想主題，這一場豐富性與兩歧性的思想運動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五四以降中國文化、思想上詭譎歧異的不同取向^①。作為張先生高足，東海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丘為君的《啟蒙、理性與現代性：近代中國啟蒙運動，1895-1925》（引用只註頁碼）一書，便是近年來嘗試重訪五四的最新力作。

晚近以來，海內外學者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不斷呈現出一些新的面相。具體而言，有學者開始強調五四運動與政治史、生活史之間的緊密關聯^②；就最新的研究取向而言，近年來諸多研究者試圖從「全球」與「地方」內外兩個維度來重新理解與闡釋五四新文化運動^③。一方面，他們注意到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需要放在全球思想史或全球範圍內思想資源的流通與互涉的視角來加以理解；另一方面，五四時期的思想潮流作為一種

緣起於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主要由上層知識份子所推動的時代強音，它在地方社會的傳播過程中涉及地域、階層、知識傳統的不同碰撞而呈現出諸多新的面向。

丘為君新著即是以全球史(歐戰，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視角來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種有益嘗試。本書在繼承張灝「轉型時代論」^④與對於五四思潮的內在理路分析的基礎上，加之以一種全球眼光，在歐戰與域外思想資源的紛繁複雜中條分縷析，執其兩端而又內外兼修，進一步揭示出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豐富內涵。本書由兩個部分組成，每個部分各有三章：第一部分主要討論啟蒙運動的一般問題，特別集中在啟蒙、理性與現代性等三大議題；第二部分為經驗研究，重心為探索新文化運動早期啟蒙思想的發展及其涵義。作者從「歐戰」的角度出發，探索這次大戰如何形塑了五四啟蒙的思想脈絡，以及「轉型時代」(1895-1925)具代表性的《東方雜誌》與《新青年》雜誌如何看待歐戰。作為本書的核心議題，作者探索的問題是：在何種意義上歐戰給中國帶來啟蒙衝擊？這種衝擊的性質是甚麼？本文將集中從全球史與多元主義現代性的研究視角來剖析本書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的拓展與創新之處。

一 「歐戰」：五四新文化源起的全球史視角

「全球史」(Global History)是歷史學界近年來方興未艾的一種史

學觀念或史學方法論，並且儼然有形成歷史學分支學科之勢。全球史的出現，是為了填補傳統歷史學縱向寫作方式所留下來的，在以民族國家為主線的歷史之間，或是在文明與文明之間的空白區。誠如論者指出，「全球史的橫向寫作方式是用一種橫向的方式觀察人類」^⑤，即是說，全球史嘗試擺脫以民族國家敘事為主線的歷史觀，試圖從不同文明的比較、互動關係中來重新書寫人類歷史。因此，它十分強調世界諸文明之間的相互關係與互動勾連，尤其注重物質與文化因素(譬如物種、商品、技術、思想觀念等)的全球傳播過程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某種程度上而言，全球史是一種出於「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的史學實踐，同時也對「西方中心論」的歷史敘事形成了巨大挑戰。

對於五四運動而言，全球史研究方法的應用與實踐依然是一個值得探索的議題。德國漢學家余凱思(Klaus Mühlhahn)注意到，五四運動爆發的1919年是十八世紀以降的世界秩序發生重要轉變的一年。是年，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獨立運動從緩慢發展到逐漸形成不可阻擋之勢。在民族自決綱領的指導下，殖民地試圖獲得獨立主權，並建立一個反殖民的新世界秩序。這一全球性重要時刻的來臨，由政治、文化、經濟等多種因素所促成，簡而言之，它是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全球化浪潮與二十世紀初期的歐戰共同作用的結果。從物質層面而言，通訊、交通形式的新發展推動了1919年這場席捲全球的抵抗

本書在繼承張灝「轉型時代論」與對於五四思潮的內在理路分析的基礎上，加之以一種全球眼光，在歐戰與域外思想資源的紛繁複雜中條分縷析，揭示出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豐富內涵。

風潮；此外，包括學生和非技術工人在內的大批人群的流動性，是1900年前後全球化的顯著特徵^⑥。

全球範圍內不斷加劇的物質、信息交流以及人的流動性，不僅加強了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交流，也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個全球範圍內的「思想市場」，它為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提供了紛繁複雜、甚至是互相衝突的豐富思想資源。在本書中，丘為君雖並未明言全球史的研究方法，然而，實際上他對於歐戰與近代中國啟蒙運動之關係的強調，已然具有全球史的研究視野。與此同時，本書對於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呈現兼顧了歷史研究的「縱向書寫」與「橫向書寫」，這也是全球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

西方史學界稱歐戰為「大戰爭」(The Great War)。「大戰爭」的說法，一方面是由於歐戰對人類社會所造成的巨大破壞性，另一方面還可以從歐戰之於現代西方文明的轉折性意義來理解。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J. Hobsbawm)更將歐戰定為「短促的二十世紀」之開端，他指出：「它〔二十世紀〕由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也就是19世紀(西方)文明崩潰的起點。這個文明，經濟上是資本主義，法律憲政結構上屬自由主義(liberalism)，其典型的支配階級，則為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科學、知識、教育、物質的進步，以及道德的提高，都在其中發光發熱。這個文明，也深信歐洲是天下中心，是科學、藝術、政治、工業、一切革命的誕生地。」^⑦又如朱特(Tony Judt)所言：「1918年以後，人人都認為往

事不再，戰後世界的特殊狀態應該使每一個人懂得並且質疑19世紀經驗與思想的長期陰影。」^⑧由此，歐戰對於西方文明史具有十分重要的轉折性意義不言而喻——它動搖了十八世紀以降以西方作為世界文明中心，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自由主義法律憲政結構以及維也納體系為核心的國際格局。

丘為君十分敏銳地注意到了歐戰的思想史意義，他明確指出作為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正是處於歐戰以降世界體系與文明內涵的深刻變化之中。本書分別從四個方面闡述與分析歐戰對於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影響：第一，從1914至1918年，通過《東方雜誌》的持續報導，中國思想界在「文本」意義上經歷了歐戰的洗禮。「文本化」的歐戰使得中國知識界對於歐戰的內涵有一個比較超然的理解，同時對西方文明的內涵(包括正面與負面)也有較深刻的認識。第二，歐戰期間，日本內閣與英國聯手進攻青島，不僅使中國在戰爭情境下體驗了歐戰，青島的陷落與接下來的「二十一條」，更使中國與歐戰在負面意義上連接起來，並啟動了影響近代中國深遠的「五四學生運動」。第三，歐戰使中國知識界對於西方產生了一種「大眾式啟蒙」的接近——透過傳播媒體的報導與分析，中國知識界第一次從「啟蒙」的意義上深刻地認識到西方文明的內涵。近代中國的「啟蒙」經驗，亦由「理論導向」轉為「傳播導向」。第四，歐戰使得中國知識份子對於西方文明由敬畏轉向懷疑，由樂觀轉向悲觀。戰爭的殘酷揭示

丘為君十分敏銳地注意到了歐戰的思想史意義，他明確指出作為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正是處於歐戰以降世界體系與文明內涵的深刻變化之中。

出西方「文明」與「野蠻」共存的面相，成為了中國知識份子的新困惑（頁44）。

具體而言，本書通過「橫向」與「縱向」兩個維度來探索歐戰如何形塑五四啟蒙的思想脈絡。

以橫向的角度而言，作者通過比較《東方雜誌》與《新青年》對於歐戰的不同態度，探索五四知識份子的內在分歧。作者認為，《東方雜誌》通過大量圖文並茂的歐戰報導，使中國知識界對西方產生了一種「大眾式啟蒙」的親近感，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文明由敬畏轉向懷疑。與此相對，《新青年》對於歐戰的認識使得陳獨秀先後經歷推崇法國文明、德國文明以及俄國革命三個不同階段，並最終形成了一種反帝國主義的激進世界觀（頁50）。

以縱向的角度而言，追蹤《甲寅》與《新青年》的關係，有助考察新文化運動的內在醞釀過程，尤其是海外思想資源的變化——同一群啟蒙知識份子，如何從海外創辦的政治性雜誌《甲寅》，演化到本土性的、文化性的《新青年》（頁50）。《甲寅》以探討中國國體問題為中心，對於文化問題並未有太多關注。然而，當它在1915年底停刊之時，陳獨秀於該年秋創辦的《青年雜誌》接手《甲寅》所留下的思想資源。不同之處在於，陳獨秀的《青年雜誌》（及其後的《新青年》）開始思考從文化、甚至倫理上根本性改造中國（頁329）。

從「政治解決」轉向「文化出路」的近代中國啟蒙運動，也可以在歐戰爆發的歷史語境下來加以理解。1914年9月，《東方雜誌》主編杜亞

泉已開始關注歐戰對於中國以及世界歷史可能造成的深遠影響，他歷數甲申、甲午、日俄戰爭諸役對於國內政局的不斷激盪，認為民國初年立憲革命「已如春夢一場，遽然醒覺矣。國民之精神，正陷於懊喪沉滯疲軟頹唐之狀態。而歐西之炮火，黃海之波濤，忽焉相逼而來，震吾耳而炫吾目」，「故今日之大戰爭，殆將為吾國未來之十年中開一變局，而特以此峻烈之興奮劑，以睨吾人耳」；對於世界而言，「則此次大戰爭之血，或將前世紀之穢惡，而培養新紀世之和平，未可知也。果爾，則世界歷史，將於此戰爭後，起顯著之大變化」^⑩。可見，諸如杜亞泉這樣具有國際視野的思想家，在歐戰爆發之初便已敏銳地察覺到這次「大戰爭」對於人類文明可能帶來轉折性的影響。對於中國問題的思考，他也相應地將目光轉移到了「文化」方面。

歐戰爆發後，雖然中國政府並未直接派軍參戰，但是歐洲戰事的發展，在中國新媒體（報紙、雜誌）連續的報導下，成為了這個亞洲新生共和國大眾知識生活的重要議題；歐洲新聞由以往的配角躍升為新聞版面的主角。可以說，一方面，歐戰使得中國知識界透過傳播媒體的力量，對於西方文明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親近感；另一方面，戰爭的巨大毀滅性使他們萌生出「西洋文明破產」的夢魘（頁250-51）。

正是在對西方文化欲拒還迎的歷史情境之下，歐戰影響了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陳獨秀的世界觀，並促使其世界觀不斷激進化。實際上，歐戰期間誕生的《青

以橫向的角度而言，作者通過比較《東方雜誌》與《新青年》對於歐戰的不同態度，探索五四知識份子的內在分歧。以縱向的角度而言，追蹤《甲寅》與《新青年》的關係，有助考察新文化運動的內在醞釀過程，尤其是海外思想資源的變化。

歐戰的破壞性影響使得啟蒙運動以降的現代西方文明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由此，五四知識份子的「新文化」圖景不再以西方文明為鵠的，而開始在文化多元主義的視野下來思考東西文明之間的關係。

年雜誌》(《新青年》)對於這場史無前例的「大戰爭」的態度一直有所變化。具體而言，陳獨秀從1915年歐戰初期的親法反德，到1916年初歐戰中期推崇德國強權主義，再到1917年主張對德宣戰，大力批判作為強權與帝國主義君主國的德意志，由此而建立了其反獨裁君主制、反帝國主義的激進世界觀(頁276、278)。此外，歐戰對於西方文明史的轉折性意義在中國思想界也激起了不小的波瀾，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靈魂人物已經開始籌劃「再造文明」的歷史圖景。

然而，經過歐戰對於中國知識界的洗禮，五四知識份子在文化抉擇上必須面臨「何種文明」的問題。歐戰的破壞性影響使得啟蒙運動以降的現代西方文明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由此，五四知識份子的「新文化」圖景不再以西方文明為鵠的，而開始在文化多元主義的視野下來思考東西文明之間的關係。

二 「普遍」與「特殊」： 多元主義現代性視角

自1918年起，世界史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究其原因，可能肇自歐戰慘烈的經驗，令人們思考打破狹隘的「民族」藩籬，重新構築人類共同體的藍圖。舉其要者，乃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與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⑩。二者皆受西方古典文明之濡染，其分析皆是以文化形態

學(cultural morphology)見長，這種文化形態學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有機體論」，它將人類諸文明(埃及、印度、中國、希臘羅馬、拜占庭、阿拉伯、古印第安、西方等)看作多元的有機體，每種文明有其自身的精神與靈魂，並且皆存在生、老、病、死的有機現象。

上世紀50年代後期英國歷史學家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提出「全球史觀」，到70年代在西方學術界得到廣泛認同，湧現出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的《世界史》(*A World History*)和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 Stavrianos)的《全球史》(*A Global History*)等代表作^⑪。這種全球史觀的理論基礎正是斯賓格勒與湯因比所開創的文化形態學，它試圖解構「西方中心論」對於西方史學界的強大影響，從多元文明的互動視角來考察人類社會的整體歷史。

有論者指出，全球史觀還可以從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的「軸心時代」(*The Axial Age*)與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的「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理論來加以理解^⑫。艾森斯塔特繼承並轉換了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的概念，提出「多元現代性」的說法，意指現代性是一種獨特文明，它與歷史上其他類型的文明的區別在於：它是軸心文明轉折的產物。通過比較中國、印度、穆斯林、日本等不同文明社會，艾森斯塔特發現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現代性道路：「現代性的歷史，最好看作是現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獨特的現代制度模式以及現代社會的不同

自我構想不斷發展、形成、構造和重構的一個故事——有關多元現代性的一個故事。」^⑬

關於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未嘗不可以放置在多元現代性的視野中來加以理解。丘為君在探討近代中國的啟蒙問題時，首先注意到了普遍主義現代性(universal modernity)與多元主義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y)之爭。相較於普遍主義所指稱的現代性內涵(科學、自由民主、進步觀、理性化、世俗化等)，多元主義現代性則傾向於批評帶有「西方中心論」色彩的普遍主義現代性觀點，轉而強調非西方的現代性可能，諸如穆斯林現代性、印度現代性、日本現代性、中國現代性，甚至是亞洲現代性等等。在近代中國的轉型時期中，思想界對於現代性的爭論，其主流常常以激進主義的形式來宣揚普遍主義現代性的傾向。相對於此，另類現代性(即多元主義現代性)的論點，則多半被當成保守主義，甚至是反動主義(頁12-13)。

本書基於多元主義現代性的視角，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線性進步史觀與文化激進主義(全盤反傳統)皆有所批判，揭示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來自不同文明傳統的思想資源，超越以往關於新文化運動中傳統—現代、激進—保守等二元對立的研究框架。更為可貴的是，丘為君通過對現代世界的多元傳統的揭示，發掘出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留有深刻印記的浪漫主義傳統。在西方的現代性經驗中，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中葉之際崛起於歐洲大陸的浪漫主義，站在

啟蒙理性的對立面，強調「特殊性」(particularity)與「個性」(personality)價值以對抗啟蒙理性所宣揚的「普遍性」(universality)與「一致性」(uniformity)(頁336)。也就是說，浪漫主義抱持一顆文化多元主義的心靈，以抵制啟蒙理性對於多元文化傳統的侵蝕，以及文化霸權主義對於現代民族國家多元建構之可能性的破壞。

此外，丘為君敏銳地發現，中國與西方的現代性體驗中存在一個不容忽視的「時空錯置」問題。現代中國與西方由於身處現代性道路的不同階段，即便是相同的思想資源也會激發出不同的歷史結果。書中指出，從現代性的視野來回顧歐戰，中國與歐洲的立足點是完全不同的。經過浪漫主義對於啟蒙理性的批判，經歷過文明高峰所產生的頹廢(decadence)現象，歐洲在大戰爆發之際，事實上已經從現代性的「日正當中」(high modern)時刻進入現代性的黃昏期(late modern)。相較於西方的現代性位階，歷經半個多世紀現代化運動的中國，剛進入新舊交替、與傳統作戰的「轉型期」，或者說是現代性的黎明期(early modern)(頁240)。職是之故，浪漫主義之於現代中國，並未如歐洲大陸上一般結出多元文化果實，而是在愛國主義與革命主義的裹挾之下，走向了極端的文化激進主義，與傳統為敵(頁337)。作為近代中國啟蒙運動領袖人物，胡適基本上排斥作為歷史主義(Historicism)意義下文化獨特性之「傳統」的可能性，不承認作為特殊性價值的文化獨特性(頁18)；陳獨秀則在對中國

本書基於多元主義現代性的視角，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線性進步史觀與文化激進主義皆有所批判，作者揭示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來自不同文明傳統的思想資源，超越以往傳統—現代、激進—保守等二元對立的研究框架。

的政治傳統以至倫理傳統的激烈批判中走向了極端反傳統的激進道路(頁333)。

如上所述，就「特殊」面相而言，中國現代性的軌轍雖然是在全球思想史的脈絡中以西方思想資源為主導形塑而成，卻深深地烙上了作為地方性知識的中國傳統印記；就「普遍」面相而言，作為近代中國歷史走向的共產革命是以一種激進的世界革命(普世主義)形態而出現的，然而，這種意義上的普世主義並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西方普世主義的東方移植，而應該在中國傳統思想資源的規定與限制中加以理解。

本書指出，近代中國的「造新去舊」運動表面上看似從激進主義那裏獲得了歷史動力，其背後卻經歷了非常複雜的傳統思想資源的轉換。在西方所主導的現代世界文明體系之中，傳統中國的儒家世界大同主義被迫放棄它自認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主義(culturalism)。然而，「十月革命」以後，中國左翼知識份子從馬克思主義的世界革命裏看到了另一個世界大同主義的曙光。誠如梁啟超晚年所預言，「馬克思是化身的希臘正教上帝，列寧是轉輪再生的大彼得」。可以說，「儒家世界大同主義並沒有一去不復返，而是透過馬克思與列寧主義在中華大地投胎轉世了。在這個新的意識形態裏，它設立了自我的新文化主義，且自信是普世的價值」(頁120-21)。

余英時曾指出，五四的思想世界由許多變動不居的心靈社群所組成，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

定義也會出現是「文藝復興」抑或是「啟蒙運動」的偏差。二者之間，「文藝復興」可被視為一種文化與思想的方案，「啟蒙運動」則是帶有政治色彩的五四圖景^④。依此而論，「啟蒙運動」意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普遍主義，「文藝復興」則內含回溯本民族傳統的特殊面相。可見，「普遍」與「特殊」內在於近代中國啟蒙運動之中，二者相輔相成。

筆者認為，從多元主義現代性的視角來重新審視五四新文化運動，可以從「普遍」與「特殊」這兩個方面來加以把握。一方面，作為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五四新文化，並不僅僅是現代西方文明的簡單複製，而是在近代中國特殊歷史語境之下中西思想資源交衝作用的結果，因此，它是西方現代性的普世主義衝擊之下重構中國文化獨特性的思想方案(「普遍」的「特殊」)；另一方面，擁有數千年天下主義遺產的中國文明，在現代世界的文明體系之中並未完全放棄自身的普世化衝動，而是試圖借助西方思想資源不斷地重燃其不可抑制的普世化想像(「特殊」的「普遍」)。此二者如鳥之兩翼，在觀察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視角中，不可或缺。

三 餘論

縱觀全書，精彩之處不可勝數，作者悠遊於古今中西的思想脈絡，加之以全球史觀的廣闊視野，既勾勒出五四新文化運動複雜的內在精神(如自由與權威的緊張、趨新與傳統的張力)，又在全球思想市場

就「特殊」面相而言，中國現代性的軌轍雖然以西方思想資源為主導形塑而成，卻深深地烙上了中國傳統印記；就「普遍」面相而言，中國共產革命以一種激進的世界革命形態出現，但這種意義上的普世主義應該在中國傳統思想資源的規定與限制中加以理解。

的流動中揭示出中國新文化運動中外部思想資源的複雜與多元。更可貴的是，本書文字背後浸透着作者一以貫之的啟蒙理想與時代關懷。

然而，在筆者而言，本書尚存猶嫌不足之處。譬如，如果從全球思想史的視角來考察歐戰與五四新文化的關係，歐洲思想史內部的文明論轉向便不容忽視。況且，歐戰的爆發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這種文明論轉向的後果之一^⑮。丘為君在書中多次提及德國浪漫主義的影響，卻未曾深入探討它與歐戰及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間的思想關聯，殊為可惜。

歐戰的爆發充滿了德意志浪漫主義與帝國主義色彩，戰爭伊始的1914年8月，德國思想家與文學家曼(Thomas Mann)寫下〈戰爭中的思考〉(“Gedanken im Kriege”)一文，認為現代西方文明將在這場戰爭中得到它應有的結果。他稱這場戰爭為一個事件——「在此各個民族的個性特徵，其永恆的容貌將有力呈現」。德國歷史學家馬爾克斯(Erich Marcks)則認為：「事實上，這恰恰是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精神和我們的歷史最深邃的力量，是它們承負這場戰爭並賦予它靈魂。」^⑯

某種程度上來說，歐戰是一場「文化」對「文明」^⑰，或者說「新文明」對「舊文明」的戰爭。無論是在歐洲還是中國，擁有敏銳洞察力的思想家諸如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斯賓格勒、王國維、梁啟超、魯迅等，皆已認識到歐戰正是改造文明、發育文明之新生命的最佳契機。歐戰前的西方文明被稱為「虛偽的文明」、「物質的文

明」、「功利的文明」，人們所期待的是文明的真精神與契合多元民族心靈的「新文化」。

實際上，本書已注意到歐戰對於世界秩序重構的關鍵性意義，並稱之為「一戰轉向論」，這一論述以李大釗為代表，強調歐戰對於資本主義政治社會體系的瓦解與代表新秩序意義的社會主義的勝利，而不只是狹義的政治社會革命意義上舊帝國主義的失敗與解體。對於近代中國啟蒙運動而言，作為左派論述的「一戰轉向論」是新文化運動「造新去舊」工程中的異數，使得五四以降的中國走向了以武力革命進行整體式的「文明再造」(頁338)。

從國際秩序的角度來解讀歐戰與共產革命革故鼎新的歷史意義，可以作為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走向的外在理路；以思想史的內部視角切入，五四後期激進革命思潮(布爾什維克)的興起依然可以在文明論轉向的脈絡中加以理解。簡而言之，歐戰的結局使得中國知識人對於西方逐漸喪失了信心，開始轉向在東西文明調和的基礎之上尋求一種「新文明」。然而，因緣際會之下，中國知識人日益將眼光投向俄國革命與布爾什維克主義，並以此為「新文明」之先聲。布爾什維克的俄國之所以能夠符合歐戰前後中國知識人對於「新文明」的想像，一方面因其對於現代西方文明有着批判與超越的思想姿態，另一方面則由於以反帝國主義為旗幟的布爾什維克滿足了中國知識人反抗西方文明的民族文化心理。

整體而言，瑕不掩瑜，本書無愧是從全球思想史的視角來研究

如果從全球思想史的視角來考察歐戰與五四新文化的關係，歐洲思想史內部的文明論轉向便不容忽視。書中多次提及德國浪漫主義的影響，卻未曾深入探討它與歐戰及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間的思想關聯，殊為可惜。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山之作。它極大地拓展了五四研究的全球史視野，以及從全球思想市場來理解五四新文化的研究空間。筆者相信，本書能夠引領更多的學者在這一研究方向上繼續邁進，從而在東西互涉的視野中更為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及其歷史走向。

註釋

① 張灝：〈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載《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200-201。

② 王汎森：〈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9年6月號，頁44-54；〈思想史與生活史的聯繫——「五四」研究的若干思考〉，《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1期，頁16-31；〈探索五四歷史的兩條線索〉，《二十一世紀》，2019年4月號，頁18-31。

③ 如德國漢學家余凱思（Klaus Mühlhahn）對於全球史與中國五四運動之關聯的研究，參見何妍整理翻譯：〈從全球史的角度重看五四運動——余凱思在華東師範大學的講演〉，《文匯報》，2014年5月5日，第12版；華東師範大學瞿駿教授等從地方社會的視角探索五四運動的傳播與演進的複雜歷程，參見瞿駿：〈勾畫在「地方」的五四運動〉，《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11期，頁109-19；卞冬磊：〈五四運動在鄉村：傳播、動員與民族主義〉，《二十一世紀》，2019年4月號，頁90-102。

④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載《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頁134-52。

⑤ 錢乘旦：〈全球史是從麥克尼爾開始的嗎？〉，《文匯學人》，2017年8月18日，第3版。

⑥ 〈從全球史的角度重看五四運動〉，第12版。

⑦⑧ 霍布斯鮑姆（Eric J. Hobsbawm）著，鄭明萱譯：《極端的年代（1914-1991）》（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9。

⑨ 朱特（Tony Judt）著，林驥華譯：《重估價值——反思被遺忘的20世紀》（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3。

⑩ 詹父（杜亞泉）：〈大戰爭與中國〉，《東方雜誌》，第11卷第3號（1914年9月），頁2、7。

⑪ 黃進興：〈從普遍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蘭克史學為分析始點〉，《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頁62-63。

⑫ 張象：〈構建中國特色的世界史體系〉，《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9月5日，第4版。

⑬ 臘碧士（Alfons Labisch）著，羅穎男譯：〈全球史與中國——一種合乎時代的、探究世界發展的路徑〉，載李雪濤、顧彬編：《全球史與中國》，第一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頁1-2。

⑭ 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著，曠新年、王愛松譯：《反思現代性》（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14。

⑮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頁276、291。

⑯ 參見薩弗蘭斯基（Rüdiger Safranski）著，衛茂平譯：《榮耀與醜聞——反思德國浪漫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頁345-49。

⑰ 在德國浪漫主義的思想傳統中，「文化」（Kultur）與「文明」（Zivilisation）是兩個相對的概念——「文化」是指內在、多元的民族傳統；「文明」意指世俗、普世的物質文明。參見艾愷（Guy S. Alitto）：《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頁24。